

十三部經書的英譯人：

漢學家 理雅格先生

張振玉

每逢我翻開清朝末葉英人理雅格先生英譯的十數冊我國的經書，看見他那儒雅和藹的畫像，對他那超人的精力晶瑩的智慧，淵博的學識，不禁景仰萬分。對黃帝子孫中自恨頭髮發黑眼珠不藍鼻梁不高，以及覺得中國語言文字文學藝術不如西洋的人，在下一向以洋奴尊稱之。但是對漢學家理雅格這個洋人，我却願給他執鞭隨鐙端茶點烟，庶足以慰生平之望。以前林語堂先生在倫敦洋行中看見蘇東坡的墨竹真跡，他當時幾乎要屈膝下跪呢。

理雅格是何如人也，請聽在下敘述一番。

公費生與獎學金的獲得人

理雅格 (James Legge) 的父母是蘇格蘭的北方人，生在一八一五年 (清嘉慶二十年) 十二月二十，在亞伯丁郡的杭特利城。讀書甚早，啟蒙師是一個盲婦，憑着記憶教他念押韻的基督教讚美詩。他以後對讚美詩始終百讀不厭，對他以後的工作事業也影響至巨。

稍後，他上杭特利城教區學校，一八二九年卒業，進亞伯丁中學，拉丁文特優，已然頭角崢嶸，絕非池中之物。一八三一年在皇家學院的公費生與獎學金的入學考試，便取得公費資格第一名，在學術的高樓上，他登上了初步的階梯。四年後，大學畢業之時，他想再躍過一級，遂與兩個同學參加考試，爭取荷頓氏獎學金。荷頓氏獎學金當時公認為只有穎慧而博學的學生才能獲得。

理雅格是公費生的第一名，當時從未有同時獲得此兩種榮譽的學生，而他却懷抱此種雄心，要兩獎獨佔。所以在專心致力鑽研古典文學之外，他又攻讀幾何、三角，以及倫理學等學科。真是天縱英才，在一八三六年他居然如願以償，獲得了荷頓氏獎，是他獲得公費第一名之後的第五年，當時年只十九歲。

他這種成就對他的價值還不只是在學術上。因為亞伯丁的考試方式極其特別，對他後來與中國士大夫相交往時，易於相互了解。因為他那份應考經驗竟與中國的省垣科學考試有很相似之處。他比其他歐洲人能特別了解中國考場舉子所需的耐性與健康，在廣州會試之時，每個考生都關在三尺多見方的小室中，幾天連續考試，毫無間斷。考生必須忍耐考試的煎熬，並且是在八月的潮熱薰蒸之下。所以考畢之時，一打開考場小屋的門，有些考生不能忍受那長期嚴酷的磨煉而病死屋內的，並不是什麼稀罕事。

在亞伯丁大學考試時，也是關在考場內，考四天，都是每天半夜考畢。但是不同的是每個學生可得到兩瓶葡萄酒，以助長精神。喝這兩瓶酒也許算是另一種考試吧？

宗教 健康 婚姻

在亞伯丁大學畢業時，拉丁文教授要留理雅格當助教，以便日後他可升為教授，但有一個條件他必須信奉英國國教。理雅格不肯背棄他父親的

教派，他說：「我不能以一時之利益而改變信仰。」乃放棄此一好機會。後來決定加入獨立新教，攻神學，擬往遠東傳教。教會醫生認為他有肺病嫌疑，經過不少周折，幾經檢查，才允許他到南洋。健康檢查通過後，又因婚姻問題幾乎與教會鬧得不快。在一八三九年與馬理遜牧師之女結婚，七月，夫婦二人由英國乘船東來。當時中國與英國因鴉片而起糾紛，林則徐燒鴉片就在一八三九年。理雅格到麻刺甲即擔任馬理遜博士在當地成立的中英學院校長職務，並監督該校的印刷廠，六年後，馬理遜亡故。

鴉片戰爭後，中國割香港與英人，並開五口通商。一八四三年 (道光二十二年) 七月六日，理雅格偕同妻子將傳教中心遷到香港，中英學院也隨同遷移。這才是他事業的開端。

妻亡子喪 風災火災

在香港，理雅格致力於傳教，辦學校，因不服水土，曾一度回國修養。回來之初，一切順利。但不幸之事，兩月之後，接踵而至。先是幼女死亡。不久颱風來襲，那天傍晚理雅格正乘小船赴廣州。此次風災，死亡數千人，理雅格的船在一小港內避難，得以不死。一八五一年，火燒香港華人區，教會學校醫院全部焚燬。次年十月，理雅格遇到了最大的打擊，妻子逝世。葬於香港公墓內幼女之旁。稍後，理雅格使三個女兒回蘇格蘭，次年，其中最小者又死亡。他萬分傷心之

下，更加緊傳教工作，研讀漢文，藉以忘憂。後來一個女兒的丈夫曾任中國海關總監。理雅格會有子二人，都在幼小時死於麻刺甲。

初到廣州

理雅格遷到香港之後，始得直接觸及中國學術的各方面；而且得有機會到廣州遊歷，與各級士大夫交游。他會有機會一見中國科學的考場，那是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）。那次他對中國的教育制度的印象甚佳。他把感想記載如下：

「中國的文化雖與我們英國的文化不同，但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。我們應當記住。他們已有四千年的歷史，國民一直繁衍昌榮。而其他古國如亞述、波斯、希臘、羅馬等，都由興而盛，由盛而衰，由衰而亡，而中國却仍然存在，有四萬萬人口。其國民必有其倫理道德偉大的力量……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那麼尊重學問，那麼仰慕文化的。」

何以傳教士要研究中國經典

理雅格氏以為西方傳教士要到中國傳教，須要先懂中國的經典，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，行為的準則，都由其經典的影響而來；其國民的思想信仰，大至其政府的形式組織，也是由其經典的精華而來。馬理遜已經開啓了研究中國語言文字之門，理雅格覺得他必須再進一步致力於研究中國普通學問，再由學問進而研究經典，以便將中國的倫理思想介紹給西方的傳教士、學人與一般民衆。他深信如果不通中國的經典，如果不能鑽研過中國聖賢哲人思想的整個領域，便不能完成一個傳教士的任務，便是不稱職。這樣一來，他倒成爲向他本國人說教了。他要把東方的學問翻譯出來，並且向西方的傳教士及學人闡述說明。他說過像下面的一段話：

中國的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思想並不是敵對的

，傳教士應當尋取其精華，不要棄置不用，不要非難批評，而要善爲利用。在中國傳教比世界其他地方容易。要以耶穌的謙和的精神傳教。用時間精力攻讀孔孟的典籍，決非枉費時日。若能避免把自己的車馬在中國聖人的墓地上粗野無禮的駛過去，基督教深入中國人心的日子便可早日來臨了。

進行出版

理雅格離英國時，已經從倫敦紀德教授學過數月中文，到麻刺甲後，又以絕大的精力繼續研讀。到香港後仍不斷用功。以理氏的語言天才，復有拉丁文的基礎，中文進步甚速，對中國古書的研究始終不懈，前後在中文上已有二十年的工夫。一八五八年，他開始盤算出版他中國經典的譯本。他頗爲焦慮的是一筆印刷費。不過當年那種時代，不像今天，那時有不須經人懇求而自願幫助文人出版的善人。幫助理雅格的就是今日香港查甸洋行的創辦人查甸先生（Mr. Joseph Jardine）。查甸記得幾年前的一件事。有一次查甸與理雅格在廣州附近一條小河中同船。那時正是太平軍初起，他們聽說有幾個太平軍官兵在附近一個小島上。理雅格勸服了船夫划到島邊，與太平軍官兵談了片刻。後來查甸會聽船夫說理雅格的中國語比船夫自己好得多。船夫的話對一個像理雅格那樣的漢學家而言，也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恭維，可是查甸却把那話聽在心裏。所以幾年之後，他聽說理雅格無力印書的苦惱，就立刻自請出資。他說：「你若不辭印書的辛苦，我願出錢。我的錢在中國賺的，只要花出去對中國人有益處，我自然應當當花。」理雅格感激之至，立刻接受。他徵求倫敦教會的許可，當然倫敦方面立刻答應，因爲他們知道此種譯本的印行，不僅有學術價值，對傳教士也大有用處。

在香港開始估價，印刷廠索價過高。查甸認

爲三萬二千港幣的半數在教會的印刷廠即可够用。理雅格在一八五八年回國，小作勾留，買印刷器材紙張裝訂布線等物，運回香港。此番回國爲時甚短，但關係甚大，因爲在此段期間之內，認識並且娶了第二位妻子。後來這位妻子給他生了二男二女。回港後，理雅格實現了他的出版計劃。

一八六一年（咸豐十一年），第一集出版，爲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。可惜查甸已死，不能親眼看見他慷慨捐款出版的書了。但查甸的兄弟繼續他兄長的允諾，仍陸續出錢，印出了二集（孟子），三集（尚書），四集（詩經），五集（春秋左傳）。香港鄧特爵士也慷慨出資，使傳教士得以半價購買。

結束傳教生活

到一八六五年，由於在亞熱帶氣候中長期辛勞，身體漸感不支。那些年內，他始終忙於研究中文，譯書，在大學教書，傳教，家庭訪問，醫院病人訪問。偕同夫人往日本度假後回港，仍感不適，寫信給倫敦教會，說自從到麻刺甲算起，在東方已然二十七年，教會中已經人才輩出，他要離港回國。次年，全家大小返回英格蘭。

爲出版書，他知道仍須再回香港，但聲明不以傳教士身分回去。他還要求准許他利用大學印刷廠。在國內事情清閒，氣候良好，身體日益康健，更孜孜矻矻，鑽研中國經典，學殖日富。譯書至一段落，又回香港，親身看印書出版。

那是一八七〇年，理雅格重遊故地，門生故舊，熱烈歡迎。但是數月之後，工作發生挫折；那年五月，自倫敦開來香港的船，在港外觸礁沉沒，船上所載理雅格的印書紙張油墨等完全損失。他寫信給妻子，說每逢他坐在走廊上望着大海，想到那天那輪船桅杆斜露在海上，下面就是他印刷材料埋葬的所在，心中多麼痛惜。但是

理雅格決不灰心喪氣，立刻再填定貨單，向英國購買同樣印刷材料。將材料分兩路東運，一半由船繞好望角，一路由船走蘇彝士運河，以減少可能的損失。一八七一年底（同治十年）第四部書出版（詩經）。次年年底，第五部出版，這部是春秋左傳。

王韜與理雅格

王韜是蘇州人，因避太平軍之亂，逃到香港。道光後幾年，在南京應學落第，隨同父親到上海。那時倫敦教會印刷廠在上海設有分廠，由麥德斯牧師主持，王韜便在那裏找到工作。當時南方戰亂蔓延，甚多學人逃難到上海，王韜得與交接。大約十二三歲時，曾返回蘇州一行。王韜有才華，當時已小有文名。那時太平軍正佔據蘇州一帶。同治元年，太平軍潰敗逃竄後，遺留下官方文書一份。清廷疑為王韜手筆。王韜否認其事，一直終身未曾承認，但他向英國領事館請求庇護，英人拒絕清廷逮捕，後不久逃到香港，為理雅格所僱用。

王韜覺得理雅格的中國學問很淵博，極為景仰，而且這位英國最偉大的漢學家也非常了解他的癖好，並沒有非難或責備他的地方。理雅格第一部譯書出版時，曾表示對王韜的感謝，他說：「這位中國學者學識的淵博，在我以前認識的中國學者之中，無人可與比擬。一八六三年（同治二年）他來到香港，與我共同研究，備極辛勞。有時向我講解，有時與我爭辯，不但對我治學上很有幫助，很多勞苦忙碌的日子裏也增添了不少興味，覺得工作輕鬆了許多。」

王韜與理雅格相處甚得，一八六五年（同治四年），理雅格回英國時，他寫了一篇序相送，這篇序文現存牛津大學中文系。在序文中王韜對理雅格甚為推崇，他說：

「……先生獨不憚其難，注全力於十三經，貫串考覈，探流溯源，別具見解，不隨凡俗。其言經也，不主一家，不專一說，博采旁涉，務極其通。大抵取材於馬鄭，而折衷於程朱，於漢宋之學，兩無偏袒。有四子書尚書兩種書出，而西儒見之，咸嘆其詳明該洽，奉為南針。夫世之談漢學者，無不致疑於古文尚書，而斥為偽孔。先生獨不然，以為此皆三代以上之遺言往訓，援引多見於他書，雖經後人之哀集，譬諸截耳編璫，終屬可寶，何得遽指為贗托而擯之也。平允之論，洵堪息羣喙之紛爭矣……吳門陳奐頌父能紹絕學，為毛氏功臣，今海內誰可繼之者？而先生獨以西國儒宗，抗心媚古……欲於羣經難，悉有譯述，以廣其嘉惠後學之心，可不謂難歟……」

理雅格獲得此種讚譽，引起英國社會的重視。都認為英國在中國的權益比德法各國獨多，而在國內研究漢學則遠落在德法各國之後。一八四七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，倫敦皇家學院（King's College）初設中文系，從香港回國的英人費榮（C.A. Fearon）為首任教授。但是古老的牛津與劍橋則迄無中文系。

任牛津大學漢文系教授

牛津大學添設中文系的建議，是由一個中國人提出的，當時立刻有理雅格的兩位友人熱心贊助。那兩人是郝烏（Alfred Howell）與泰樂（J.B. Taylor）。在阿果克爵士（Sir Rutherford Alcock）領導之下成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委員會，其中包括曾在中國的商人官吏，並有戴維斯爵士（Sir John Davis），籌集三千英鎊做為中文系的開辦費。牛津大學當局甚為熱心，並願聘請理雅格主持該系。但當時牛津的教授必須牛津或劍橋出身，而理雅格却不是。以理雅格漢學的

造詣之淵博，補救之道並不難求。考普斯學院（Corpus Christi College）自開始就支持這項計劃，於是將理雅格選為該院的研究員；牛津大學的副校長提請經過學校的學術會通過，贈與理雅格文學碩士學位。這一切不合學校規定的困難似乎已然克服，但却忘記理雅格仍然不是合法考入該大學的學生。那位副校長在一八七六年一月五日致函考普斯學院院長，表示忽略了學則的規定。只得又設法為理雅格安排了入學試驗。

終於符合了牛津的習慣、傳統、學則等規定，身非牛津劍橋出身而又非英國國教的理雅格，才成了牛津大學的中文系的第一位教授。在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七日，他在就職講演中說：「為了與中國政治、宗教、商務的理由，為了完成大學的追求真理與教育的理由，牛津成立了中文系。」

回顧理雅格過去成就的卓越，似乎可以相信此後他不致於在學問上再奮勉研求了，但這種想法與事實正好相反。牛津的環境令人精神愉快，他又身心健康，於是把豐富的學識大量的傳授給學生。在教室、在書房、在大講堂，在鄉野漫步時，他隨時隨地誨人不倦，隨時仔細將知識與智慧的種子散佈在學生的頭腦裏。同時又以源源不絕的著作印刷出版，公諸世界，使各國的漢學家獲得豐富的資料，認識中國文化的精髓。

理雅格的譯著

除去前述的英譯本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孟子、書經、詩經、春秋、左傳之外，理雅格還譯出了孝經（光緒五年），易經（光緒八年），禮記（光緒十一年），道德經，莊子，太上感應篇（光緒十七年），離騷（光緒二十一年）。

在他禮記的譯本序文中，他說：「如今禮記兩卷譯出，從二十五年前開始翻譯中國典籍起，這是我在漢學上努力的總結，心中頗感安慰。當



理雅格 (James Legge) 的照片

年亡友朱連 (Stanias Julien) 曾寫信問我是否有意翻譯禮記這樣厚大的書，並且不相信我能譯得完。但是我開始之後，終於譯完了。」

在大部頭的禮記譯完之後，他的翻譯工作已達巔峯，在七十歲以前，已譯完中國的古典名著。但對理雅格而言，巔峯並不等於終止。在光緒十二年他又譯出晉高僧法顯的佛國記，光緒二十一年譯出了離騷。最後，楚辭未譯完而逝世。那

是光緒二十三年，西曆一八九七年，也就是義和團發生的前三年，年八十二歲。

蓋棺論定

艾肯斯博士 (Dr. Joseph Edkins) 在理雅格逝世不久，在上海講道時，曾說：「憑着他的譯品，歐美讀者可以認識中國，因為書中的格言諺語都有支配中國學者人民的力量，西方學人得以了解中國的文化。」

至於他的譯筆，有時因對中文忠實而失去英文的自然。有時為表明中國一個字，他也許會費一整行，這是艾肯斯的評語。英譯聊齋的 Giles 認為他對漢學的貢獻無人可與比擬。今人耿蔚成認為他的孟子鍛鍊似覺不夠，用字涉於生僻。作者也認為如與後來譯文相比，他的文字似嫌冗長，而過分拘於原文的字面。其實理雅格的英文修養當然很好，他譯文的風格自己也知道。在四書修正版的序文裏他說：「我曾一度想將譯文修正，使其較為簡潔而華美，但考慮之後，仍然為了忠實於原文而未予變動。」

理雅格的翻譯中國經典，並不限於翻譯，對原文有豐富之注解，考證與長序。如論孟子的性善說時，會將荀子的性惡與韓愈的原性等引證出來。注釋四書時引證的中國書有三十餘種。單單

注釋就約有原文的兩倍。其精力之強，魄力之大，態度之嚴肅，只憑這幾點，我們向他應當致最高的敬禮，對自己應當汗顏思過。

他的葬禮舉行之日，他的老朋友牛津大學曼斯斐學院的院長費百恩 (A.M. Fairbairn) 說：

「理雅格生性真誠大度，嚴正而濟以幽默。晚年至牛津，儀容秀美，高風至德，非常人可盡知。……他非常愛中國人，垂危之時，尚在病榻上接見往訪之中國青年。」

一九二八年 (民國十七年)，法、義、荷、德、美等國漢學在牛津開東方語文會議後，各國教授代表團同往理雅格墓前獻花致敬。一代碩學鴻儒，誰不生高山仰止之感！

牟少玉著作書目

黛綠年華 每冊拾伍元

花自飄零 每冊拾伍元

贖罪 每冊拾肆元

紅衫淚 每冊拾肆元

總經理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漢口街二段一號二樓